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2.05.008

文学与市场

——乔治·吉辛的城市观念与文化想象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重演了一百多年前英国所遭遇的众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 英国人的现代经验既是英国的, 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重读维多利亚晚期重要的城市小说家乔治·吉辛, 会使我们跳出以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野, 发现许多跨越政治文化的共同经验。诸如中下层阶级的崛起对于文学、文化状况的影响, 经济压迫与男性气的衰落, 创作性艺术家的沦落和艺术的商品化等等。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乔治·吉辛以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点, 揭示了文学的市场化对于文学、学术乃至文化和文明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 现代城市毁坏了哲学、艺术和文学存在的条件, 而这正是整个社会乃至文明向粗鄙和平庸退化的表征。

关键词: 乔治·吉辛; 文学与市场; 城市观念; 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2)05-0090-08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 被视为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同时也被誉为“现代城市小说家”的杰出代表。^[1] 吉辛自视为伦敦的漫步者和观察家, 毕生以伦敦为基地, 致力于对伦敦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研究, 置身于“艺术和工业、作家和社会观察家的边界”,^[2] 考察现代性和商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自

188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黎明中的工人》(*Workers in the Dawn*) 至1903年去世, 吉辛以其二十多部作品的容量, 展现了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 诸如伦敦底层社会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运动、房屋租赁、工资与物价、社会达尔文主义、妇女的教育与就业、男性气的危机、婚姻的困境、拜金主义和文学的商业化等等问题, 体现了吉辛对于这个时代社会的认识 and 文化的想象。正如雅克·科格(Jacob

收稿日期: 2012-02-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资助项目(05JA750.47-99011)

作者简介: 陈晓兰(1963-), 女, 甘肃张掖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Korg) 所说,吉辛的作品集中“反映了19世纪英国的文明状况”,“以其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描绘了人类生活的黑暗面”。^[3]如果说,吉辛所敬仰的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盛期是“一个奋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诗中有着“忧愁和抑郁”,“但也有奋斗、道义的胜利和征服”,^{[4]288}那么,吉辛的创作时期(1880—1903)却是英国危机四伏的时代,大英帝国已变成一个“疲惫”的“蹒跚的巨人”。^{[4]330}经济增长缓慢,工作机会减少,工资收入下降,占英国人口1/3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人口稠密的贫民区,^{[4]334}而一生穷困潦倒的吉辛本人也不时沦为伦敦贫民窟的住户。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基本音调就是困苦,而艺术家就应该传达出这种困苦。困苦,也是贯穿其所有作品的核心主题。吉辛所看到的英国风景也是一片苍凉和衰败,作为时尚和金融中心的帝国首都伦敦则意味着“大规模的穷困和个人的屈辱”,^[5]一个“金钱统治的黑色礼服的世界”。^[6]在这里,生活变成了为生存的战斗,文学事业变成了交易,艺术变为商品,作家退化为写手,在强大的社会力量和金钱的逼迫下,具有崇高品格、良好教养、学识渊博的人或者沉默,或者死亡,或者堕落。在吉辛看来,这正是社会乃至文明向粗鄙和平庸退化的表征。

毋庸置疑,吉辛对于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及文化的这种悲观认识来自于他所身处其中的伦敦,但吉辛本人一贯持有的贵族精英意识和对于古代社会的怀恋,却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评价。

吉辛出身于中产阶级,具有良好的古典学教养,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终身保持着对古希腊、罗马作家及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喜爱,同时还深受歌德、叔本华和孔德的影响,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者。若不是大学二年

级时,为了拯救一个在街上遇见的妓女而偷盗并被判拘禁,或许他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大学里从事教书和研究,远离纷扰的世俗世界。但是,青年时期或是源于情欲,或是出于道义的行为,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社会底层,过着一种与他的智力水平不相匹配的生活,从事一种拥有“自由”但却毫无经济保障的“文士生活”,一个“彻底的自我主义者”,“不愿在公司里为一个雇主服务,但在文学市场上,却在服侍一群主人”。^{[7]56}吉辛在内心深处认同于一种被放逐的边缘者身份,在思想和情感上,他既不归属于那个时代的职业文人,又鄙视他赖以生存的读者大众,而事实上,文学市场和读者大众也从未真正接纳过吉辛,他的写作也从来没有使他摆脱经济困境和底层社会的生活。

早在1710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正式的版权法案,^{[8]199}之后又出台过一系列相关法案。到吉辛生活的时代,文学的商业化和写作的职业化早已成为普遍公认的现实。吉辛所敬仰的狄更斯算得上文学市场上的成功者,吉辛说他是“伶俐并有精力的买卖人,由律师的忠心朋友帮助,有时比他的出版家得的更多”,但狄更斯却“受了他那时代和阶级的不幸影响,为努力增加(不是为他自己)已经很多的财产而死”。^{[7]195}被吉辛称为“通俗派的一个可敬佩的作家”^{[7]193}的安·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靠写作赚取了6万多英镑,他把文学视为男男女女藉以糊口的“行当”,在他看来,作家和艺术家与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演员、建筑师、屠夫、面包师一样,需要养家糊口,以“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使生活尽可能舒适一些”是合乎情理的,而要求作家、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不考虑钱是“不合人情的自我牺牲”。^{[9]74}他母亲弗朗西

丝·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 50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赚取了400英镑,直到76岁生命终结时她一共创作了114部作品,这些作品的收入相当可观,是她自己和全家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9]24}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版权法和文学商业化的获益者,作家如何用作品换取金钱完全依赖于书商和读者市场。正如西蒙·艾略特(Simon Eliot)所说“许多作家在金钱方面都是名声不佳,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作家拿到的非常少,从来就没得到他应得的;部分原因是,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家和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如果与肮脏的利润发生瓜葛,就会被玷污。”^{[8]197}同样,对于文学的市场化,吉辛也依然坚持着这样的传统观念,虽然他不得不为了摆脱贫困而创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穷困潦倒的处境下写就,但他作品的收益却从来没有使他摆脱经济的压迫,他不时地居住在伦敦的贫民窟,娶的是无知无识、缺乏理性、酗酒、粗鄙的下层女子,两次错误的婚姻使他倍感坠入社会底层的痛苦。但在吉辛的内心里,始终怀有一种“贵族优越感”和强烈的精英意识。他理想的人民应该有良好的教养,举止高雅,品德高尚,感觉敏锐;他理想的社会是“伯里克利的雅典和奥古斯都的罗马,尽管它们不真实,但却不像维多利亚的伦敦那么丑陋、粗鄙”;^{[10]16}他理想的“文化”、“文明”是有教养、文雅、书籍和“自由深奥的知识”,是诸如由古希腊诗歌韵律和古书所象征的世界,“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古典文学代表了一个帮助吉辛逃避现实的避难所”;^{[11]117}他理想的生活是摆脱了劳作和穷困的逼迫,蛰居于乡间,有闲暇和心的安宁,无忧无虑、无功利地“为自己的快乐、为自己的安慰和增加力量而读

书”;^{[7]84}吉辛坚守着传统的非功利的、创造性的文学观和浪漫主义式的对于乡村的怀恋,他憎恶现代城市,蔑视以伦敦群众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及其文化水准和审美趣味。他与文学职业化的关系如同他与大众的关系,厌恶但无法摆脱。疏异甚至自我放逐正是吉辛个人社会处境和心理归属的主要特征,正如他所言,“我从世界的边缘上经过,我以历史为生活”,^{[7]76}“生活在现在却怀恋过去;理论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者;渴望与人相处,但又本能地需要孤独;虽然从一种抽象的政治正义感出发献身于大众的事业,但同时又憎恶这个阶层语言的粗鄙,对其动物般的习惯深表厌恶。他小说的核心主题是金钱、婚姻和大众,而在他的思想深处,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不受经济限制的哲学和诗歌”。^{[10]16}在吉辛看来,现代城市没有哲学和诗歌的地位,也没有诗人、艺术家的立足之地,城市毁坏了哲学、艺术和诗歌存在的条件,诗人或艺术家只有回归乡村和大自然才能再度得到诗神缪斯的顾怜。

二

以19世纪80年代伦敦文艺界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新格拉布街》(*New Grub Street*, 1891)反映了在不可抵挡的文学市场化中,新闻、报刊文学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造性、思想性文学艺术的强烈冲击。具有高尚品德、良好的修养并固守传统文学观念的文人沦落到社会底层;而将艺术当作买卖、当作职业,迎合大众趣味,从事新闻、报刊时文写作,道德堕落、才华平庸的文人,却上升为“时代人物”,吉辛将这种现象视为整个社会文明粗鄙化和退化的表征。

小说通过文具商尤尔家族两个儿子的冲

突和生存现状的对比,揭示了主导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对于学者、文人的蔑视和冷酷无情。约翰·尤尔靠经营纸厂发了大财,并在市镇委员会占有重要的一席。在他眼里最没出息且有害无益的行当便是从事文学一类的脑力活动,文学无非是用他造出来的纸印成的字体,人们应该在户外活动而不是坐着看印刷字体。他认为向大众普及文化就是“把一般人弄得身体虚弱,眼睛近视,消化不良”。^{[12]24}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削弱文化在城镇的影响,他希望废除“写作这一行”,他甚至认为应该对那些写作的人判处劳役监禁。他把最差的纸张供应给书籍出版商,他对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弟弟艾尔弗雷德·尤尔极其苛刻,他死后没有留给这位穷困潦倒的作家一分钱。而他留给侄女艾米·尤尔——作家雷尔登的妻子——的1万英镑,也落入了堕落文人米尔文·贾斯珀之手。雷尔登贫病交加,死在旅馆,米尔文·贾斯珀则与艾米·雷尔登结婚,这笔遗产帮助他结交了文艺界的名流,摇身一变成为主导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大人物。吉辛通过尤尔对文化的理解和对文人的鄙视,揭示了这个时代中产阶级主流社会的文化、文学观念。

小说中作为“时代人物”着力表现的主人公米尔文·贾斯珀,其价值观和文学观与商人约翰·尤尔一脉相承。他出身于一个兽医家庭,在某学院接受过两年的教育,父亲死后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遗产,他必须自谋生路。他从瓦特镇来到伦敦报考公务员失败,却发现文学或学术也可以成为赚钱的行当,他为报刊撰写各种文章,四处寻找机会,巴结名流,认识各杂志的主编,其为人、为文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准则。他说“我只是为了赚钱而写文章,绝不为了写作而写作。我的全盘计划,种种努力:一切以金钱为出发点。我不会让任何因素妨碍我的物质条件的改善。”^{[12]141}他需

要舒适的生活和奢侈享受,而凭良心写作、说自己心里话的代价却太大。“时代人物”米尔文成功的秘诀在于他的冷酷无情和道德堕落。他原以为玛丽安·尤尔可能会继承约翰·尤尔的可观遗产,当他得知她继承了5000千英镑时便立刻向她求婚,可是得知遗产落空时便暗中向另一位有财产的女士求爱,遭到拒绝后又转向有1万英镑遗产的艾米·雷尔登求婚。缺乏文学修养和品行不端的贾斯珀因为懂得迎合当代市场而大获成功。与他气味相投的惠尔普代尔,一度在美国的特洛伊经历了饥寒交迫的困顿,最终放弃了小说写作,靠教学生写作、撰写报刊文章为生,他为迎合市场将《闲谈》改为《谈天说地》而大获成功。

在这个“庸人胜利”^{[13]90}的功利主义时代,在贾斯珀、惠尔普代尔这样的堕落文人上升的同时,坚持独创性、追求真理的雷尔登、贝芬、艾尔弗雷德·尤尔或者沉默或者死亡。他们既不像贾斯珀之流适时调整自我、降低学术水准以顺应时代潮流,也不愿意放弃道德情操以便于在文化市场上进行倾轧竞争,在商业社会,他们消极、迟钝、软弱无能。

主人公雷尔登的悲剧命运典型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激情、传统文学观和文化理想的彻底溃败。他虽出身于功利心极强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但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世界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理想是成为学者,过独立、自由、宁静的书斋生活。但是,杂志社不接受任何无名者的文章,他的学者梦很快破灭,于是转而写小说。但是,他的学术修养和道德情操以及传统的文学观,使他厌恶任何平庸无聊、肤浅恶劣、迎合读者趣味的东西,他鄙视报纸和新闻文学,厌恶广告。但是,生存的压力和市场的需要通过他的妻子艾米不断向他施压,要求

他放弃自己的准则为金钱而写作,放下自尊和人格,巴结有权有势者,靠文化的阶梯爬向社会上层。爱米之所以嫁给雷尔登,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部分人依然认为通过文学获得的名利和地位是体面干净的。爱米爱慕虚荣,讲求实际,虽然举止优雅但缺乏真正的学识,品位低下,缺乏崇高的情操、理想和深刻的理解力。她认同这个势利社会的准则:人人都应该为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一切代价。她不断逼迫丈夫“必须为了卖钱而写作”,“艺术必须是当一行买卖来活用。这是一个商业时代”。“你不肯迎合时代,同时又没能力独立生活,结果只是死路一条。要迁就、切合实际,将艺术品变成一桩买卖。把严格的理想标准,什么值得写,什么不值得写,一股脑儿给丢开。”^{[12]64}任何小说到她手里,都以讲求实际的眼光去阅读。她关心作家成名的始末,与出版公司的交往,文艺报纸上的漫画栏、杂志的幕后新闻,谁在给出版公司看稿等等。雷尔登与爱米的关系体现了文学与中产阶级的关系,雷尔登不仅不能改变爱米,反而被爱米归化。在经济的压力和妻子的逼迫下,雷尔登逐渐丧失了自我,面对爱米和孩子,他为不能养家糊口而羞愧不已。雷尔登听从从妻子的建议开始考虑市场的趣味,靠写作为生,靠头脑生活,结果使他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自己的内在召唤与妻子的要求和市场的声音在他的心灵中交战,使他才思枯竭,他不再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最后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他“最大的希望和快乐就是躲到黑暗温暖的角落,不被人注意,不被人想到,麻木地躺在那里,让自己慢慢地死亡”。^{[12]228}雷尔登最终放弃了写作,卖掉了藏书,在一家医院门诊找到了一个收费工作并搬到贫民区居住。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在一家旅馆,与此同时,唯

一的儿子也夭折。像雷尔登这样的文人既无家可归,也后继无人。

雷尔登的失败是双重的,既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作为男人的失败。雷尔登事业溃败,丧失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家庭地位,受到来自文坛和家庭的双重嘲弄和蔑视,在公共、私人领域的权威感丧失殆尽。“一位小说家写不出小说;一个丈夫养活不了他的妻儿;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一心要去做不通文墨的人所做的事,领极低的工资——在人们冷嘲热讽的谈话中生活。”^{[12]299}具有强烈男性气的吉辛将文人在文化界这一公共领域和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双重失败视为英国文明的退化和民族的衰败。在小说中,作家作为一个男性在文化市场上的成败直接影响着其家庭生活和作为家长的权威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如果付不出钱来,他就没权利对任何事情提出要求。爱情也不例外。”^{[12]308}穷困潦倒的现实主义作家贝芬终身未娶,最后在郊外自杀。学识渊博、将文学视为生命的艾尔弗雷德·尤尔娶了一个无知无识的下层女子为妻,婚姻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将他变成了一个忧郁、脾气暴躁的人,他忍受着无法摆脱的精神孤独。艾尔弗雷德精读博览、文思敏捷、笔锋犀利,具有健全的理解力,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一切都已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为累赘。他在这样一个学术和文学写作不再神圣、崇高且文人间相互仇恨的冷酷社会艰苦挣扎,勉强维生。强烈的精英意识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与其智力不相匹配的生活环境,在“他心中郁积了文人生活中的怨毒,被仇恨心理所控制;这种心理使人轻信一切邪恶,使人变得盲目、失去理智”。^{[12]205}

吉辛通过文人在文学市场竞争中的生存斗争和道德困境以及他们阴郁的家庭、婚姻

关系,表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商业化和民主化不仅败坏了文化标准,也改变了社会生活,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的毁灭。由于文坛的败坏和文人的堕落,大量短命的、内容贫乏的作品产生,中下层阶层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主导着文化潮流,作家不再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而是大众的雇佣。这样的现实导致了年轻一代对于学术和文学的深刻怀疑。长期为父亲做助手的玛丽安·尤尔,整天坐在阴暗的大英博物馆,她常常感到沮丧。“像她熬磨的这种生活,究竟有什么裨益与目的?世上已有多得人们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她却在这儿绞尽脑汁,去烂造一些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稿,人们甚至无意否认它们只是市场上日常销售的商品……讲到写作,难道它不是负有重要使命需向全世界宣告的人独自享有的快乐与权利吗?她明知她父亲并没有负有这一使命。至于她,如果不是由于需要挣钱,她真乐于丢掉那支笔。再看她周围这些人,除了要从现今已有的书中写出一些新的书,将来再让人家从这些书中写出更新的书,此外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这样浩如烟海的图书,多得逐渐使人不便运用,只担心迷失在它们当中,好像到了一片茫茫沙漠中。”^{[12]126}在她眼里,“全部文艺工作像是一个恶性肿瘤”,^{[12]205}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像一个阴森森的鬼魂,被贬谪到下界四处游荡,沿着无尽的书架永生永世没完没了地寻找下去。坐在按辐射形排列的书桌前面的读者,他们不完全像一群不幸的苍蝇吗:投入了一面巨大的蛛网”。^{[12]127}

《新格拉布街》集中展现了吉辛对于维多利亚晚期文化及文明的悲观主义判断。这种判断既来自于吉辛自己二十多年来在文学市场上的挣扎和经济失败,也来自于他一贯坚持的精英立场,同时,也来自于他对大众观念和

主导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否定。

三

吉辛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伦敦并对伦敦有着切身体验,他以伦敦为出发点思考维多利亚晚期的一切社会问题,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反都市主义和反现代倾向。在他看来,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和文明状况的退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一方面遭受着经济的压迫,受到贫穷、粗鄙、缺乏理性和自我约束力的社会底层的拖累,同时又受到拜金主义的中产阶级市侩的威胁。在他笔下,主导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产阶层品位不高,缺乏教养和想象力,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如同底层的穷人一样赤贫,吉辛将他们都划归到难以文明化的群众(crowd)或曰大众(mass)之列,而群众或大众正是吉辛思考、表现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

吉辛出身于中产阶级,并对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有着切身的体验,同时,他大部分时间又处身于社会底层。早期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他对于社会底层的观察和认识,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同情,他甚至试图对这个阶层恶劣的物质生活以及相应的精神状况予以改进。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状况不仅取决于这个阶层贫困的生活现实,更来自于社会环境的恶劣而造成的精神上的低下和心智的不健全,因此,大众难以教化,也难以改进。他中期的作品将注意力转向中产阶层,集中表现这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同时也表现了知识分子与这个阶层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在内心深处,吉辛怀有强烈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他在晚年所创作的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自传体散文《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1903) 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和他对于文学、文明、英国社会的认识,并重新审视了他对于个人乃至社会的评价标准“我一向总是对智慧敬而远之,在哲学家的声调铿锵的句子中,在诗人的黄金的韵律中,我觉得智慧在一切东西中是最可爱的。”^{[7]45}在这一点上,吉辛与欧文·白璧德所界定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贵族气的人文主义者具有相通之处,即“对于那些未受教育与规束的卑下者”抱有某种有限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人道主义的冷漠与倨傲”,对于“粗鄙世俗的轻蔑”,^{[13]9}觉得自己在“两个方面高于芸芸众生,这首先是凭着他的信条与纪律,其次是凭自身信条与纪律赖以传达的学术媒介”。^{[13]10}吉辛不仅沉湎于古希腊文学与学术,而且接受了古希腊贵族式的民主思想。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普通大众的态度“我不是人民的朋友。人民作为一种力量,作为决定时代倾向的力量,他们唤起我的怀疑与恐惧;作为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群体,它使我远远地避开,并经常激起我憎恨的感觉。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所谓人民指的是伦敦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温和的词语,可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想法。……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反民主的。我不敢想当德莫斯(希腊城邦的平民)以压倒优势的力量统治英国时,英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7]73}约翰·凯里(John Garey)指出“吉辛似乎是第一位阐明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对抗情形的英国作家。”^{[11]106}吉辛从早期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底层大众阶层的同情、怜悯和拯救与改造,走向中期对于中产阶级生活和价值观念的社会学分析和文化考察,最终对于组成英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中下等阶层丧失了兴趣和希望,他对于社会改革和民主化、现代化持怀疑、悲观态度。

吉辛在晚年时由于一笔意外的馈赠,得以离开伦敦,隐居乡村,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朴素、宁静、冥想的生活。在《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中,他从隐居的、乡村生活的视角回望过去曾经在伦敦所经历的像苦役犯一样劳累而穷苦的文人生涯,表达了他对于他一生以智慧为出发点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的反思“我一向愚蠢傲慢,我常常拿一个人的智力和成就来评判他的价值,在没有逻辑的地方我看不出好,在没有学问的地方我看不出美。现在我想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智力,一种是属于脑的,一种是属于心的,我认为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7]74}他认为,仁慈、和蔼、谦虚、慷慨,这些都是心的智慧,组成真正的文明的东西是“正义与和平”,一个人也许智力生活高超,但另一面却存在着道德上的野蛮性。“一个人可以是很好的考古学家,但却对于人类的理想没有同情。历史学家、传记家,甚至诗人,也可以成为金融市场的赌徒、社会的谄媚者、叫嚣的爱国狂者或肆无忌惮的阴谋家。至于那些科学的领导人,有哪一个乐观主义者可说他们站在美德的一边呢?”^{[7]88}在他看来,心的智慧和美德只能产生于宁静的乡村。而在喧嚣的大城市,无家可归的不稳定感,不幸贫苦的困扰,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冷酷无情的自我主义,麇集在客厅里的高谈阔论,都不可能使人类的灵魂得到片刻的安宁。岁月在生存的挣扎中不被察觉地溜走,摇笔杆的人数虽然成倍增长,拥塞于出版部的门庭,但他们却不可能承担起提升社会文明的使命。一个文人,只有告别了这种生活,回归乡村,回归大自然,才能重新获得诗意的人生和心灵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John Goode. George Gissing: Ideology and Fiction [M]. London: Vision Press, 1978: 20.

- [2] Emma Liggins. *George Gissing, the Working Woman, and Urban Culture* [M]. Alb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xi.
- [3] Lewis D Moore. *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 A Critical Analysis* [M].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8: 9.
- [4] 戴维·罗伯兹. 英国史 [M]. 鲁光桓, 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 [5] Peter Keating. Review of *Victorian Writers and City* by Jean-Paul Hulin [J]. *Victorian Studies*, 1980, 23 (3): 401-402.
- [6] 董乐山. 奥威尔文集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368.
- [7] 乔治·吉辛. 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 [M]. 李霁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8] Simon Eliot.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C]// Delia Da Sousa Correa.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vel: Re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97-228.
- [9] 安·特罗洛普. 特罗洛普自传 [M]. 张禹九,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A C Ward. *Gissing* [M]. London: Langmans, Green & Co Ltd, 1959.
- [11] 约翰·凯里. 知识分子与大众 [M]. 吴庆宏,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08.
- [12] 乔治·吉辛. 新格拉布街 [M]. 叶冬心,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13] 欧文·白璧德.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 [M]. 张沛, 张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Literature and Market

—George Gissing's City Concept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CHEN Xiao-l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Many obstacles that Britain came acros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are now challenging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is sense, the British modern experience is both Britain's and part of our ow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ading works of George Gissing, an important city novelist in the late Victorian Era, will help us no longer be restrained to the old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ideologies but find much shared experience beyond polit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oppress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nliness, the degeneration of creative artist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rt, etc. With strong elite consciousness, George Gissing, based on classical humanism, demonstrates how the marketization of literature negatively affects literature, academia,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him, the modern city destroys the existence condition for philosophy, art and literature, which exactly symbolize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even civilization, to becoming vulgar and average.

Key words: George Gissing; literature and market; city concept; cultural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魏琼)